



## 干部南下

## 建设新区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迎接全中国的解放,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地方干部紧随渡江大军南下,军队打到哪里,地方干部也要到哪里,解放一个地区,巩固一个地区。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老解放区抽调各级干部5.3万人,其中分配到华北1.7万人。同时规定了区党委、地委、县委的干部人数。

根据党中央部署,12月5日,中共晋中区党委发出指示,拟从晋中区外调干部1400名。1949年3月,晋中区党委和太原市委合并,共抽调南下干部1681名。

1949年3月上旬,各地南下干部以县为单位到石家庄集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调整组建各级领导班子,做思想工作,学习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学习一些新区的政策、接管经验和到新区后的守则纪律等。

其间,华北局指示将察哈尔省、冀中区、太行区的南下干部并入晋中南下区党委。与晋中区先前组建的3个地委,共计组成6个地委、36个县委、216个区委。

原晋中南下工作团书记武光(原名张青甫,河北省深泽县人)曾回忆,当时的中共晋中党委一分为二,他主要负责将准备南下的干部组织成六套政府班子。

4月26日,上级宣布结束学习,组织干部迅速南下。为方便行军和保密,实行军队建制,对外称晋中南下工作团。下设6个大队,大队下设中队,由县委书记和武装部长分别担任指导员和中队长,生活上一律享受中灶待遇。他们从石家庄市出发,沿京汉公路经邢台、邯郸,绕过国民党军队盘踞的安阳、新乡,跨越黄河,在中原局所在地开封市作短暂停留,然后抵达河南省巩县。

这些南下干部别离故土,别离父母妻儿,远赴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他们克服种种困难,闯过思想关、艰苦关、语言关、生死关,与当地干部一起建立人民政权,为新解放区的开辟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开封,由邓子恢召集晋中南下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干部谈话,传达此行南下的目的地在湖南,并说明湖南省委领导干部已经配齐,明确将晋中南下区党委改组为长沙地委班子。对此重大变动,区党委、地委、县委各级干部从党的利益出发,愉快地接受了党组织的安排。

在巩县,进行整编后,共设置3个地委,分别为长沙地委、衡阳地委和会同地委。6月上旬,晋中南下工作团分批离开巩县,因信阳以南仍在敌军手中,改走陇海、津浦线,到南京、武汉,最后于七八月间进入湖南长沙、衡阳、会同等地区,胜利完成了历时半年、跨越7省、行程3000多里的南下行军任务。

在晋中工作团南下的同时,10月下旬至11月,晋绥南下干部分批从临汾出发,随贺龙、李井泉等第18兵团向四川进发,总人数约1.5万人,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入川工作团”。他们经西安、越秦岭,最终于1950年初,到达四川、西康一带开展工作。

组织大批干部南下,这是特殊时期党的干部的一次战略大调配,是老区对新区的干部大支援、大充实。他们把老区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新区,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完成了政权接管、筹粮筹款支援前线、剿灭土匪、平定叛乱、稳定社会秩序及土地改革等各项任务,有力地支援了新区的开辟和建设,为新解放区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张文平

海红果是晋陕蒙交界地带的特色果品,在山西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这种外形类似苹果的小红果,在古代典籍中叫“柰”,是中国苹果的古称,一般认为由新疆天山西部的野苹果驯化而来,个头比今天的苹果小很多,口感也大不一样。

古代文献中最早记载“柰”这种水果的,见于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樟柰厚朴。”汉晋时期的《西京杂记》则进一步记载,汉代上林苑栽培有紫柰、白柰和绿柰等三种。湖北省江陵县望山战国墓曾经出土过苹果及其种子,很可能就是古文献记载的柰,如果该考古资料可信,则表明柰在中国已有近3000年的栽培历史。

到了汉朝,人们已经对柰这种水果非常熟悉了。两汉以降,产柰的地区不仅有山西、陕西,还有四川、河南等地。到了东晋时期,随着大批士族的南徙,柰也被传到江南。南北朝时梁代医药学家陶弘景就曾经说过:“柰,江南乃有,而北国最丰。”

考之典籍,柰最具名气的产地在当时的河西走廊。当时,从河西走廊传入我国内地栽培的苹果类果树,除柰之外,较早的还有林檎。林檎,早称“里琴”,西晋郭义恭《广志》改为林檎,又称来禽。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呢?郭义恭解释说:“林檎,一名来禽,言味甘熟则来禽也。”是说这种水果成熟了以后,味道甘美,把飞鸟都吸引过来了。关于林檎的形态,郭义恭描述“似赤柰”,弘景则说林檎与柰“相似而小”。由此可见,林檎应该是果实比柰小、颜色赤红、味道甘甜的一类品种。或许因为林檎的颜色赤红之缘故,它的一些品种被后世称为“花红”。花红,也叫海红,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海棠。

在古代典籍中,柰、林檎、花红、海红、海棠等都是指野苹果中的小果类型,由于形状、大小、味道比较近似,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如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认为:“柰有红、黄、白,北方呼火刺宾。陈子良曰:大长者柰、圆者林檎。一名来禽,俗名花红,红多曰海红。”火刺宾大约是元末明初北方少数民族对柰的称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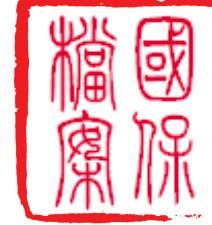
火刺宾还有一个非常雅致的名字,叫“西府海棠”。唐代“安史之乱”中,肃宗朝廷停留在陕西凤翔长达八个月的时间。因凤翔府在长安(今西安)以西,民间习称“西府”,沿用至今。因此,生长于“西府”一带,即以首都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地区的海棠,便被称作“西府海棠”。

# 汾河畔的石器长歌

吾参邀

## 【古交遗址】

古交遗址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古交镇后梁村,大川河、原平河、屯兰河与汾河的交汇地带。由王家沟、后梁、古钢(古交钢厂)、长峪沟、凤凰崖等旧石器时期遗址组成。古交遗址的发现,不仅丰富了汾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内涵,而且填补了代表旧石器时期中期的丁村文化和代表新石器时期早期的鹅毛口文化之间大型打制石器的空白。对研究以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为特点的“匼河——丁村系”文化系统的形成、传播有着重要意义。



晨光初染吕梁山脉,汾河水裹挟着黄沙穿过层叠的黄土台地。站在古交镇后梁村的高处,脚下是四条河流的交汇处——大川河、原平河、屯兰河在此投入汾河的怀抱。就在这水脉纵横的阶地上,沉睡着一部跨越数万年的石器史诗。

沿着高出汾河水面约50米的台地行走,黄土断面里不时闪现深色岩层。这便是古交遗址群的脉络:东西绵延5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狭长地带,王家沟、后梁、古钢、长峪沟、凤凰崖等遗址如星辰散落,串联起从旧石器时期早期到晚期的完整文明链条。

### 王家沟:石斧劈开鸿蒙

踏入最东端的王家沟,第四级阶地的砾石层在阳光下泛着青灰。1990年的春天,考古工作者曾在此发现太原地区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弯腰拾起一片棱角分明的角页岩,想象旧石器时期的某个清晨,古人用这种硬度极高的岩石猛击砾石,剥下长达80毫米的锋利石片。

18件石制品从这片土地苏醒,砍砸器的刃缘仍带着开天辟地的锐气。它们静卧在更新世的地层中,成为整个遗址群最古老的记忆。指腹抚摸过粗粝的断面,远古的敲击声仿佛穿透时空在掌心跳动。

### 古钢遗址:巨器的诞生

转向古交钢厂旧址,钢铁机械的轰鸣早已远去,但另一类“重工业”遗迹正从黄土中显露真容。1959年冬天,考古学者王泽义在此发现第一枚旧石器时,大概不曾预料将揭开中国旧石器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一件长24厘米、宽13.5厘米、厚7厘米,重逾5斤的巨型三棱尖状器在此现身。

这件枣叶形巨器,背面保留着天然石皮,尖端仅经简单修打便形成锐利三棱,握持处却精心修整出圆润边缘。这矛盾的设计昭示着实用智慧——既保持杀伤力又避免割伤手掌。遥想中更新世晚期的猎人,手执这史前利刃走向莽原的身影,竟与展窗外钢厂退休工人蹒跚的背影重叠成文明的双生影像。

### 长峪沟:文明的传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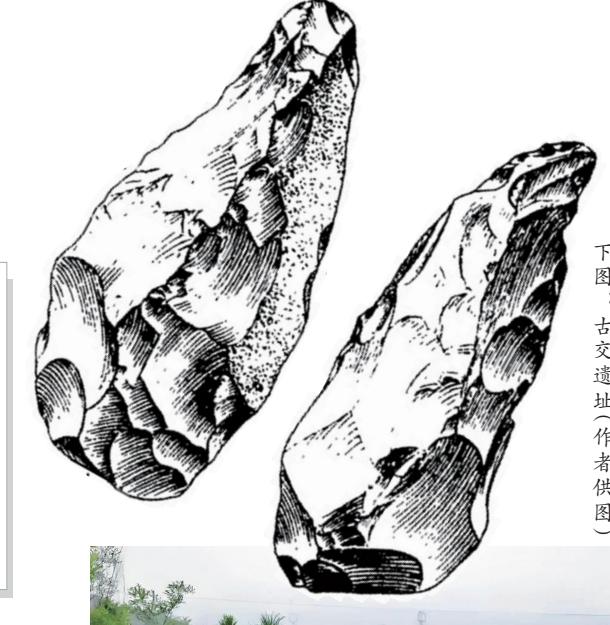
太原地区唯一的旧石器中期遗存深藏在长峪沟的怀抱。林间的风裹挟着石屑的气息,1983年发现的8件石制品中,一件长21厘米的三棱大尖状器横空出世。它的横断面呈现完美的正三角形,单向加工的边缘如经过几何测算。更奇妙的是,其形制竟与50公里外丁村遗址的器物如孪生兄弟。

考古学家称此为“匼河——丁村系”文化系统,这些散布汾河流域的遗址群,恰似旧石器文明传播的驿站,将技术从汾河岸边接力传递至吕梁深山。

### 凤凰崖:万年前的“兵工厂”

西行至凤凰崖,景象骤变。山坡上石核石片如星斗铺陈,最大石核重达42斤,堪比孩童大小的角页岩上布满取片疤痕。此处是晚期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匠人们在此建立了一座露天“兵工厂”。

蹲身翻动一件留有清晰打击点的石片,棱角锐利得划破空气。考古报告显示,此地石器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证明当时石料开采、粗加工、精修整已形成完整流水线。散落坡地的205件石制品中,有尚未成型的半成品,也有废弃的残次品,恍然可见先民们腰系兽皮,在叮当声中打制狩猎工具的场景。晚风穿过山谷,仿佛送来万年前劳作的回响。



左图:三棱大尖状器示意图  
下图:古交遗址(作者供图)



暮色漫过汾河时登上凤凰崖顶峰,西望可见狮子河流域——2019年的考古调查在那里发现95处旧石器地点,却呈现出与古交迥异的小石片传统。这差异究竟是不同族群的印记,还是因地制宜的智慧?答案仍深埋黄土。

遗址入口处的保护碑上刻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字样。自1959年首次发现,到2013年跻身国保,这片土地从煤海深处托举起比煤炭更珍贵的文明之火。山脚下古交市的灯火次第亮起,现代街巷与旧石器遗址在时空上重叠。那些砍砸器刮削过的兽骨早已化作尘埃,但人类用石头对抗荒芜的勇气,仍在每一盏倔强亮起的灯火中燃烧。

此刻,三棱尖状器的锋芒刺破历史长夜,凤凰崖的石屑在月光下泛起微光。



(16)

# 马可·波罗笔下的太原

张 悅



(AI生成)

马可·波罗是世界著名旅行家,1254年出生于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父亲和叔父都是当地富商。1271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由威尼斯出发,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经两河流域、波斯及中亚等地进入今我国新疆境内,后经过河西走廊来到元上都,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三人为蒙古朝廷做事。

当时的马可·波罗正值年少,风华正茂。他迅速学会蒙古语和汉语,而且擅长辞令,办事干练,受到忽必烈、蒙元贵族及汉族上层的赏识。忽必烈经常派年轻的马可·波罗巡视全国各行省,还曾代表元朝政府出使安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有一次,马可·波罗受忽必烈派遣,由元大都(今北京)出发,先后至今河北、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地巡行。1295年,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曾在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下简称《游记》)中提及了自己在今山西境内的经历,作为当时元中书省“腹里”地区的太原府,也出现在他的《游记》中。

《游记》中写道,“从涿州经契丹省向西旅行十天,我们到太原府城(Tainfu),那时候我们经过许多好的城市集镇”。所谓的“契丹”并非为契丹族,而是当时中亚、西亚及欧洲外国人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统称。马可·波罗还写道,由大同府向太原府南下的一路上有许多城镇、关隘和乡村,及“工商繁盛之聚落与美丽田亩”,细心的马可·波罗还注意到,在大同往太原的路上,许多村落都建有围墙,与中国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一致。时至今日,在雁门关附近的山阴、代县、广武等地,依旧存有金元时期的城墙遗址。当时的太原府为华北名城,金元至明代都有“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之称,马可·波罗被太原府的繁华深深吸引,他写道,“这城很大很华丽,城中商业(手)工业很是繁盛”。这一时期的太原,虽历经金元时期的战乱破坏,但在元初忽必烈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下,逐渐恢复了生机。作为元朝政府“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冀宁路”的行政中心,太原汇聚了各路人才和资源,为后来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可·波罗的太原之行,为元初的太原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域外视角。从繁盛的工商业、独步华北的葡萄酒酿造,到发达的桑蚕业与煤炭开采、使用,再到有礼的居民与完善的救荒制度,《游记》中的点滴记载,既印证了太原的历史盛名,也折射出当时山西的经济活力与社会风貌。这段跨时空的记录,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更让太原的古代文明在世界视野中留下鲜明印记。

西山出屋角,峰色共东家。  
墙上频过酒,篱边数见花。  
岭云连岁晚,乡树极天涯。  
汾水相思处,残阳几度斜。

——清·陈廷敬

《与比邻孙侍御怀傅隐君青主》  
这首诗应是傅山过世后,在京做官的陈廷敬回到山西时,与友人专程到傅山故里西村,凭吊缅怀这位气节非凡、学养名列“清初六大师”之一的山西先贤。通过对傅山故里景致的赞美,寄托了陈廷敬对先贤傅山高尚气节的仰慕。

西村位于太原西北鲁仁山下,汾河从村前流过,山清水秀,风景宜人。“西山出屋角,峰色共东家”,诗句一开始,就写出了傅山故里地势地貌:从屋檐一角延伸出去,是连绵耸立的西山,苍茫蓊郁的山色连起了傅山故居和东门的邻家。第三、四句“墙上频过酒,篱边数见花”,描绘了一幅可亲的乡村生活图画:站在矮矮的墙头下,可与东邻频频举杯对酒,院子的篱笆边一次次花开,有酒有花,多么赏心悦目!“篱边竹下邀旧朋”是古诗中一种常见的意象。

前四句写实,也有想象。面对眼前景色,诗人思绪万千。“岭云连岁晚,乡树极天涯”:山岭之上茫茫的云彩啊,与薄薄的晚照相映成辉,浓浓的乡间树木,将缠绵的绿荫铺到了天涯。此刻,山水苍茫,老屋静立,故人远去,晚辈缅怀敬仰之情恰如汾水长流,不觉感慨“汾水相思处,残阳几度斜”;遥想先生曾隐居高敞在这美丽的汾水之滨,夕阳啊,曾经几度升几度落……

这首五言律诗从写景到怀人,文辞清新,意境开阔,情感深沉,层层推进,表达了陈廷敬对先贤傅山真挚的怀念。

傅山的学识、思想、成就、气节,数百年来,巍然屹立;陈廷敬作为清初名臣,学问渊博、品质高洁。二人皆生于明末,傅比陈大31岁。明转清那年,傅山37岁,陈廷敬只有6岁。两位山西历史上的杰出人士,同代同乡的先贤、后辈,是否有见面的缘分?

清康熙二年(1663),隐居中的傅山前往河南辉县过访儒学大师孙奇逢,此地距阳城很近,“病休”在家的陈廷敬可能趁此机会拜访过傅山。此时,陈廷敬20多岁,刚步入仕途不久,心中必有诸多困惑希望当面向傅山请教。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傅山辞世时,魏象枢、陈廷敬所写祭文中有关“儒林恸失其师表兮,四方闻讣而含悲”(《翁红龛集》)之言,满含情谊。《与比邻孙侍御怀傅隐君青主》一诗中的“汾水相思处,残阳几度斜”,也透露出他和傅山有过交往晤谈。

在陈廷敬后来的治学中,其思想观点、方法之大端,与傅山多有契合。因此,特意前往推崇敬仰的先贤故里缅怀故人,也在情理之中了。

申毅敏

故里怀先贤  
山水寄仰慕



(54)